

台語

# 羅馬字 之歷史定位

董芳苑\*



## THÂU-SŪ

Châi chit Tâi-oân tó-lâi, hâk-bûn sī hōe-tūi chin kú lah! Chū chin-chiā<sup>a</sup> kú ē í-chēng, hâk-bûn sī kan-ta kú ē thâk-chheh lāng teh bat; í-gōa tōa pō-hūn ē lāng, chiū-si chò seng-lí-ê, choi-sit-ê, á-si chò kang-ê, it-chhè kap hâk-bûn sī chha-put-to lóng bô koan-hē. Koh-châi hiah ē thâk-chheh lāng só thâk só bat-ê, lóng sī kú pah nī á-si kú chheng nī chēng ē lāng só giân-kiù ē kú chau-phoh; khah-chē sī lóng bô thang báp sī-sè. Chióng-tiong khiok iā-si ū hit hō put-si to sī chin, kàu tó-lôh to sī ē hâp-ēng ē bó hâk-bûn; chóng-si hō hiah ē thâk-chheh lāng chhiau-pōa<sup>a</sup> liáu í-keng láu-láu bô mē-kak.

Goân-lâi hâk-bûn sī tui chē-chē lāng ē keng-giām, chē-chē lāng ē sim-su lâi choi-chit kiāt-chiā<sup>a</sup>-ê. Kóng chit kú khah bēng, hâk-bûn chiū-si beh chhián-bēng sū-bút ē chin-ké, hó-phái<sup>a</sup>, súi-bái ē koan-hē, chheng-lāng hiáp-lék só chò-chiā<sup>a</sup>-ê; thang kóng sī chheng-lāng kong-ke ē chhián-sán. Só-í hâk-bûn sī lāng-lāng to lóng tiōh ài ū. Lāng ē thâu-náu bô hâk-bûn, pí pak-tó bô chhián-mih sī khah chhám. Tâi-oân ē hâk-bûn hōe-tūi kàu chhin-chhiū<sup>a</sup> kin-á-jit chit ē khoán; m̄-bián kóng kàu sīm-mih hâk-bûn; kan-ta bat-ji ē-hiáu siá phoe ki-siáu ē lāng, chit chng-siá chóng-khēng m̄-chai ū kú lāng?

Châi chit Tâi-oân tó-lâi, thang kóng hâk-bûn ē ki-hng, í-keng sī liân-sòa chin-kú chin-kú lah! Chheng-lāng ē cheng-sim í-keng sī iau-gō kàu kék-khám.



近年來，政府當局以及民間人士，都在積極推展台灣社會「本土化」運動。這是一個很值得肯定之起步，因為藉此可以遏阻那些外來文化過份之影響，使斯土斯民能夠「尋根」與「不忘本」。令人雀躍者，就是行政院領導團隊之一的教育部，也於中、小學九年一貫教育政策下，積極主動推行「母語教學」。一面從民間網羅經過考試合格的母語教師（福佬話、客家語、原住民語、福州語四種母語教員），另面培養專職教師之母語教學能力以便備用。此一政策性措施，委實可以讓全國人民加以肯定。雖然母語教育之推動迄今只有三年多，時下卻已經頗有成果。其顯著成績可見之於國內各縣市的中、小學之中。這不能不說是新政府著重本土化教育之一大貢獻。以往民間已經有不少有志人士關心斯土「母語」之保存，有些人更致力創作母語教學之拼音字母，他們之用心與努力委實令人起敬！然而也有負面之現象困擾學界，因為已經出現四十種以上的母語教學拼音法，分別於福佬話、客家話、及原住民話之中。並且各家皆自立門戶，個個均在強調其拼音法作品之優越性。從此導致時下台灣的母語教學拼音字母相當分歧，不但因此困擾了母語教學之教師，更加困擾了學童。由於各縣市中、小學母語教師教學上的需求，下列三種之母語音標比較被普遍接受。即：「台語羅馬字音標」、「TLPA字母音標」及「通用字母音標」（尤其是客家話）。理由無他，為的是這些母語教學拼音法的課本豐富，教材均備。當然大家能夠為本土的「母語教學」推出不同的拼音法（音標），對於促進本土母語教育之付出委實毋庸置疑。然而問題也隨之出現：這麼多套的母語教學拼音法（音標），在時下台灣各縣市中、小學校實驗之結果，誠然造成紛亂之局面。如此情形，不但母語教師有其自己所專長的拼音法堅持，當學童面對這麼多套的母語拼音法（音標）之時更是難以適從。往後日子，當學校當局要求學童應用拼音字母書寫「母語

---

\* 董芳苑 輔仁大學、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時，拼音字母無法一致的問題將更為嚴重。為了這個緣故，今年已有台灣各地五十二個民間團體及兩萬多名人士連署，籲請教育部趕快訂定以「台語羅馬字」為標準的部定母語拼音字母。如果以實際需要而論，他們的訴求並非無的放矢，應該說是十分必要。究其理由，不外「台語羅馬字」的拼音法歷史悠久，迄今已有183年之歷史。並且早就「文字化」，因為它是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協助台灣社會文盲識字閱讀書刊的一種重要文字。對於促進台灣社會現代化之貢獻，更表現於文教與醫學之上。同時此一「台語羅馬字」拼音文字又可以和國際社會接軌，尤其是亞洲地區許多國家都在使用。<sup>1</sup>它之所以被人誤解及排拒的理由，除了被名為「教會羅馬字」（因為長期以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聖教會、真耶穌教會都在使用，故簡稱「教羅」）外，也於國民黨執政時代受過白色恐怖之打壓（1975年教會羅馬字聖經均被全數沒收）。<sup>2</sup>「台語羅馬字」既然被打壓與政治醜化之結果，台灣各縣市中、小學校要接受這種拼音字母，自然是怕怕的。有了這些事實，就不能不說是白色恐怖時代留下來的後遺症。時下學界必須正視者，就是「台語羅馬字」不只是一種「拼音文字」（音標）而已，它已經是一種流通久遠之「台灣語文」，也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其重要性絕非「TLPA音標」與「通用音標」字母所能比擬。

1 從1820年英國「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宣教師麥都思牧師（Rev. Walter H. Medhurst）發明羅馬拼音「白話字」之後，它不但在馬來西亞華人地區流傳，稍後也擴及於新加坡、泰國、及中國福建閩南地區。其貢獻是給華人基督徒方便閱讀「聖經」，以及其他佈道刊物。

2 1975年台灣尚處於國民黨政權的「白色恐怖」時期，當局因憎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於1971年12月29日發佈『對國是的建議與聲明』的政治性宣言（其時世界各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使其進入「聯合國」），因而肆意沒收教會使用的「母語」（福佬話與原住民各族語言）的《新舊約聖經》以及《聖詩》，強化其「北京話」同化政策。於是長老教會當局在是年的九月十八日發佈『我們的呼籲』宣言，公開要求政府當局歸還各種「母語」的白話字《聖經》與《聖詩》，放棄繼續打壓台灣各族群的「母語」（鄉土語言）。上列兩個政治性宣言收錄於：董芳苑，《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再版），台北：台灣中信，2002年11月），pp.57-64。



關於「台語羅馬字」歷史定位的問題，將分為：文字化之歷史發展過程、社會教育之文字角色、及促進台灣現代化之貢獻等段落，來證明它是一種可與國際社會接軌之重要「台灣語文」。

## 一、文字化之歷史發展過程

「台語羅馬字」出現於歷史舞台之年代，可以溯及公元十九世紀初葉。它的出現直接和「基督教」（Christianity）宣教運動有關，也可以說是西方基督教宣教師之集體傑作。

### （一）發明人麥都思牧師（Rev. W.H. Medherst）

基督教在亞洲地區的宣教活動，明顯地和西方各國在亞洲的殖民經略有關係。因為基督教之宣教使命強烈，其宣教師也趁著機會東來亞洲進行宣教活動是十分自然的事。英國基督教宣教師麥都思牧師（Rev. Walter Henry Medherst, 1796 - 1857）受英國「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於1817年來到馬來西亞的麻六甲（Malacca）與新加坡（Singapore）華人地區佈教。這兩個地區的華人都講著「閩南語」（福佬話）鄉音，然而信徒識字無幾卻大多數是文盲。麥都思牧師為要協助這些多數的基督徒文盲識字，使他們能夠吟唱聖詩與閱讀聖經，因而用心在1820年發明一種以「羅馬字」拼音的易讀文字，並稱它做「白話字」。<sup>3</sup>是年麥都思牧師就出刊他的處女作：《白話字小字彙》，將閩南語羅馬字拼音加以文字化。經其推行結果，原為文盲的基督徒男婦老幼很快就學會這種拼音文字。他

3 羅馬字拼音的「母語」（鄉土語言）不同於「漢字」那樣難學，它是可以應用於各種「母語」（福佬話、客家話、福州話、潮州話）的易學又容易讀寫的拼音文字，因此古來就稱為「白話字」。



們不但會閱讀聖詩與聖經，更會利用它來寫作書信與文章，從而在教會中流傳開來。後來麥都思牧師發現這一羅馬拼音文字不但能夠協助那些華人基督徒識字讀經，對於新進的西方宣教師學習「閩南語」更是方便。於是計劃編輯一本更完備周延之閩南語「白話字」字典。就在他發明這種羅馬拼音文字的十二年後，於澳門出版歷史上第一部「閩南語」（福佬話）的白話字字典，定名為：《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32），全書有一篇64頁之序言，本文達860頁之厚。這部字典以「漳州腔」的發音為主，應用所謂「十五音」的通俗音韻，其中共計收錄有一萬兩千個字。<sup>4</sup>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閩南語（福佬話）羅馬拼音白話字字典，成為後來出現的所有「廣東話」、「潮州話」、「福州話」、「客家話」等等羅馬拼音「白話字」字典之藍本，其貢獻既大又深遠。

## （二）早期的貢獻者

十九世紀初東來亞洲華人地區宣教的西方宣教師，因鑑於麥都思牧師發明的羅馬拼音「白話字」文字實在十分實用，是公認用於宣教地區的宣教與教育之利器。於是經過後來一些有心的宣教師不斷努力與改進，終於使其能夠有效地應用於華人社會各種方言之中。就像美國「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所屬之海外宣道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派遣的宣教師——衛三畏牧師（Rev.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 - 1884），就應用羅馬字拼音文字刊行「廣東話白話字」讀本：《拾級大成》（1842年）與《英華音韻撮要》（1856年）等書可以為例。由此可見，此一羅馬字拼音「白話字」應用於當代華人方言之

4 見：賴永祥，《教會史話》〔一〕，（台南：人光出版社，1990年），pp.61 - 63，〈教會白話字的源流〉條目。



廣。他於回國御任宣教師之後成為「耶魯大學」教授，其另一名著就是《中國》（The Middle Kingdom）。<sup>5</sup>至於應用羅馬字拼音的閩南語（福佬話）白話字宣教與寫作之後起之秀，其代表性人物也有下列幾位：

#### 1. 打馬字（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美國歸正教會（American Reformed Church）派駐中國廈門宣教師——打馬字牧師（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 1819 - 1892），是將羅字拼音的「廈門腔白話字」加以實際應用，並且推廣於中國福建宣教地區的先驅與貢獻者。他於1847年受上述的“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派駐廈門宣教，是時的廈門已經有英國倫敦宣道會，美國歸正教會與蘇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師在進行佈教工作，他們也引進麥都思牧師的羅馬拼音「白話字」在宣教師與華人信徒當中應用。只是它並非以「廈門腔」為主，用起來頗感不便。於是打馬字牧師致力加以改進，並於1852年在廈門刊印一本：《TŪG-ŌE HOAN-JĪ CHHO-HĀK》（唐話番字初學，1852年）之入門書，因此成為典型的羅馬字拼音「廈門腔」白話字課本。它雖然僅只十五頁，卻是一冊居功甚大的初學指南。1853年又以「廈門腔白話字」翻譯《舊約聖經》中的《路得記》，名為：《LŌ-TEK Ê CHHEH》（路得的冊）。1892年打馬字牧師去世時留下一本《Ē-MŪG-IM Ê JĪ -TIÁN》（廈門音的字典）遺稿，經過後人將其整理，並於1894年在廈門刊印。<sup>6</sup>時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使用的羅馬字拼音白話字聖經：《SIN-KŪ-IOK Ê SÈNG-KENG》（新舊約的聖經），就是根據其「廈門腔白話字」所翻譯的。

<sup>5</sup> Loc. cit.

<sup>6</sup> Ibid., p.62, 又pp.173 - 176, 〈打馬字的字典〉條目。



## 2. 羅啻 (Rev. Elihu Doty)

與打馬字牧師一樣，羅啻牧師 (Rev. Elihu Doty, 1809 - 1864) 也是美國歸正教會派駐於中國廈門的宣教師。他是最先應用羅馬拼音「廈門腔白話字」來翻譯《新約聖經》各卷單本之貢獻者，其代表作就是刊行於1852年的《IOK-HÂN THOÂN HOK-IM-SU》(約翰傳福音書)。1853年又於廣東出版一冊對西方基督教宣教師學習「廈門腔白話字」大有幫助的工具字典：《翻英華廈腔語彙》(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 1853)，內容計有十五章214頁。<sup>7</sup> 由此可見，一百多年來通行於台灣(不管長老教會或民間)的廈門腔羅馬拼音「白話字」，就是打馬字牧師與羅啻牧師這兩位美國歸正教會宣教師的先驅性貢獻。

## 3. 杜嘉德 (Rev. Carstairs Douglas)

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師——杜嘉德牧師 (Rev. Carstairs Douglas, 1830 - 1877)，係於1855年抵達中國廈門。這位台灣教區開拓之啟蒙者及基督教引進者，具有過人的語言天份。當他學會廈門腔閩南語之後，相當清楚當代宣教師的宣教工具「語言」，正是來自學習羅馬拼音「白話字」的經驗累積而來的。於是著手編輯一部比較完整的閩南語白話字字典，來協助初初來華學習當地語言的宣教師。最初他參考麥都思牧師之字典所收錄的「漳州方言」與「十五音法」，抄錄已故美國長老教會宣教師盧壹牧師 (Rev. John Lloyd, 1813 - 1848) 的《廈門語字彙》遺稿。同時也參考打馬字牧師的《唐話番字初學》(1852年)、羅啻牧師的《翻英華廈腔語彙》(1853年)、與施敦力亞力山大牧師 (Rev. Alexander Stronach) 的《廈門腔字典》進行其編輯事工。<sup>8</sup>

<sup>7</sup> Loc. cit.

<sup>8</sup> Ibid., pp.85 - 87, 〈杜嘉德編「廈英大辭典」〉條目。



稍後美國歸正教會、英國倫敦宣道會、及蘇格蘭長老教會駐廈門的三個宣道會，一致認為有編輯一本比較完整的羅馬拼音「廈門腔白話字」字典之必要，就決議協助杜嘉德牧師的字典編輯計劃。於是美國歸正教會正式指派打馬字牧師（Rev. J. van Nest Talmage），英國倫敦宣道會指派施約翰牧師（Rev. John Stronach, 1810 - 1888）加以協助編纂。1873年杜嘉德牧師終於完成這本定名為：《廈門音漢英大辭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1873）。它係由設於倫敦的英國長老教會總會出版，內容有序言、緒論及說明19頁，字典本文計612頁。雖然以「廈門腔」福佬話為主，然而也收錄漳州、泉州、漳浦、同安、惠安、南安、安溪、長泰、晉江、永春、灌口等地方言之腔音。其特色是：全書沒有「漢字」，只用羅馬字拼音來標明腔音。依作者說法其理由有三：(1)很多方言腔找不到適用之漢字，(2)利用假期在英國排印無法印出漢字，(3)作者抽不出時間在使用漢字的外埠監印。這本大辭典雖然不用「漢字」，卻是一本當代所有學習閩南語（福佬話）的西方宣教師、商人、官員、船員、譯員、及學生之重要工具書。<sup>9</sup> 因為這本重要字典並無「漢字」，又對醫藥、動物、植物之字彙較少收錄，後來就由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駐台宣教師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 1849 - 1935）加以增補。並於1923年在上海印刷出版，定名為：《廈英大辭典增補》（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1923），內容有序言與說明5頁，辭典本文276頁。其特色是收集杜嘉德牧師原版本辭典

9 cf. Carstairs Douglas, 《Chinese -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 - Chew and Chin - chew Dialects》,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1873, all rights reserved in 1899.



所沒有的漢字與片語、字彙〔其中有台灣中部佈教先驅梅甘霧牧師（Rev. Campbell N. Moody）提供的四百多個字彙與片語〕。<sup>10</sup> 1970年台北市古亭書屋曾經再版杜嘉德牧師原著與巴克禮牧師增補版本（合為一冊），並以《廈英大辭典》為其書名。

#### 4. 麥嘉湖（Rev. John Macgowan）

麥嘉湖牧師（Rev. John Macgowan, ? - 1922），係英國倫敦宣道會宣教師。他於1860年先抵上海，1863年轉來廈門參與宣教事工。他的「廈門腔」閩南語字典《英華口才集》（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出版於1871年，係來華宣教師很好的一本「廈門腔」閩南語的初學指南（它也是杜嘉德牧師所編輯字典的重要參考書之一）。後來他又根據杜牧師的《廈英大辭典》為藍本，於1883年出版其厚達611頁的《英廈辭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s, 1883）。這是一本以英文為主，漢文與「廈門腔」羅馬拼音「白話字」為對照的辭典，所以對於駐華西方宣教師學習「廈門腔」閩南語（福佬話）的幫助很大。麥嘉湖牧師在華宣教前後達四十年之久，而後退休返國。1922年在故鄉與世長辭。<sup>11</sup>

此外尚有幾位早期「廈門腔」羅馬拼音白話字文獻的重要貢獻者，他們就是：美國歸正教會宣教師胡理敏牧師（Rev. Alvin Ostrom）、美國長老教會宣教師盧壹牧師（Rev. John Lloyd, 1813 - 1848），英國倫敦宣道會宣教師施約翰牧師（Rev. John Stronach, 1810 - 1888, 又叫施敦力約翰）與養威

10 見：賴永祥，Op. cit. pp.89 - 91, 〈巴克禮增補杜辭典〉條目。also see: Carstairs Douglas & Thomas Barclay, 《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3.

11 see, Carstairs Douglas, Op. cit, pp. vii-ix, 〈Preface〉。這位學者宣教師除了著作「廈門腔白話字」字典外，也著有：《中國民俗》（Chinese Folklore, 1890）及《中華帝國史》（The Imperial History of China, 1902）。亦見：賴永祥，Op. cit, pp.93 - 94: 〈英廈·荷廈等辭典〉條目。



廉牧師 (Rev. William Young) 等人。倘若沒有這群先驅者的用心與努力，閩南語（福佬語）羅馬拼音「白話字」是不會於歷史上出現的。

### (三)廈門腔白話字聖經之出現

前已提及早期基督教宣教師所贏得的信徒，僅少數識字（漢文）而多數為文盲。而基督教向來要求其跟隨者一定要會「吟詩」與「研讀經典」。吟唱「聖詩」可以死背，至於研讀經典——《新舊約聖經》，則非要識字不可。當代的「漢文」帶有濃厚的八股文調調，文盲的基督徒根本難於在短時間中學成。待羅馬拼音「白話字」一發明，正可以使文盲的基督徒於很短時間裡學會。事實也證明相當有效，於是基督教宣教師即抓住機會著手利用羅馬拼音「廈門腔白話字」來翻譯《新舊約聖經》。下面列述之譯本，就是他們的貢獻。而此一「白話字聖經」之出現，正可以印證「台語羅馬字」是一種道地的「語文」，不只是「拼音符號」而已。

#### 1.最初的廈門腔白話字聖經

根據英國「聖經公會」(Bible Society) 圖書館所典藏的聖經版本歷史目錄：T. H. Darlow & H. F. Moule, ed.,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2 Vols., London: Bible House, 1903 - 1911, in 4) 所示，早期羅馬拼音「廈門腔白話字」單本聖經的譯者與經卷，若按照年代排列有如下面：<sup>12</sup>

- (1) 1852年，羅密 (Elihu Doty) 翻譯「新約聖經」中的《約翰傳福音書》，全書有46頁，在廣東刊印。其出版受到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派駐

<sup>12</sup> 見：賴永祥，Op, cit. pp.69 - 71，〈早期的閩南話聖經〉條目。



廈門宣教醫師楊雅各（Dr. James H. Young，駐華期間1850年到1854年）出資協助。

- (2) 1853年，打馬字（J. van Nest Talmage）翻譯「舊約聖經」中的《路得記》，全書有20頁，在廈門刊印，附有序言。
- (3) 1863年，胡理敏（Alvin Ostrom）翻譯「新約聖經」中的《馬可福音傳》，在廈門刊印。
- (4) 1867年，施約翰（John Stronach）翻譯「新約聖經」中的：《使徒行傳》，全傳151頁，在廈門刊印（有「廈門腔」與「漳州腔」兩種版本）。
- (5) 1868年，打馬字（J. van Nest Talmage）翻譯「新約聖經」中的《路加福音書》，全書148頁，附有地圖，在廈門刊印。
- (6) 1868年，施約翰（John Stronach）翻譯「新約聖經」中的《彼得前、後書》（16頁）與《啟示錄》（40頁），均於廈門刊印。
- (7) 1870年，打馬字（J. van Nest Talmage）翻譯「新約聖經」中的《約翰一、二、三書》，全書24頁，在廈門刊印。
- (8) 1871年，施約翰（John Stronach）修改羅啻（Elihu Doty）原譯的《約翰傳福音書》，並定名為《約翰福音傳》，全書65頁，在廈門刊印。
- (9) 1871年，打馬字（J. van Nest Talmage）翻譯「新約聖經」中的《加拉太書》（全書14頁）、《以弗所書》（全書11頁），《腓立66書》（全書10頁）、及《歌羅西書》（全書10頁），四卷均在廈門刊印。
- (10) 1872年，打馬字（J. van Nest Talmage）翻譯「新約聖經」中的《馬太福音傳》，全書108頁，在廈門刊印。

以上所列為「廈門腔」羅馬拼音「白話字」《新約聖經》各卷之譯本，也正是此一「白話字」文字化之先驅性作品。

## 2. 閩南語白話字《新舊約聖經》之出版



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首任駐台宣教師——馬雅各醫師（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5 - 1921），於1865年來台佈教之前，即先在廈門學習「廈門腔」的閩南語（福佬話）。其時他已肯定羅馬拼音閩南語「白話字」之於基督徒教育之重要性，便從1871年開始利用其閒暇時間參考前人的翻譯，準備出版整本羅馬拼音「廈門腔白話字」的《新約聖經》。1873年馬雅各醫師在蘇格蘭格拉斯哥所監印的《LÁN Ê KÌU-CHÚ IÂ-SO' KI-TOK Ê SIN-IOK》（咱的救主耶穌基督的新約）一書，終於順利出版。全書總共有406頁，譯者群為：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師倪為霖牧師（Rev. William Macgregor）、宣為霖牧師（Rev. William Sutherland Swanson）、與高休牧師（Rev. Hugh Cowie），美國歸正教會宣教師羅啻牧師（Rev. Elihu Doty），打馬字牧師（Rev. John van Nest Talmage）與胡理敏牧師（Rev. Alvin Ostrom），以及英國倫敦宣道會的施約翰牧師（Rev. John Stronach）等人。這本經典一出版，的確使那些不懂漢文但只會讀寫羅馬拼音閩南語「白話字」的基督徒很大的幫助。因此流通甚廣，不僅在台灣地區使用，中國廈門、以至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教區都在流通。英國倫敦的「聖經公會」有鑑於此，便於1882年加以刊印發行。

馬雅各醫師因為受到羅馬拼音閩南語「白話字」《新約聖經》出版以後成功之鼓勵，旋於1884年再度監印《KŪ-IOK Ê SÈNG-KENG》（舊約的聖經），並於是年由英國倫敦的「聖經公會」出版發行。這本羅馬拼音「廈門腔白話字」的《舊約聖經》，同樣是由美國歸正教會、美國長老教會、英國倫敦宣道會、蘇格蘭長老教會眾宣教師集體合作、由漢文「文理聖經」加以重譯者。自1880年開始刊印其單行本，至1884年才全部完成而合印為一冊。<sup>13</sup>

13 見：Loc, cit。



至此羅馬拼音「廈門腔白話字」的《新舊經聖經》，可算是大功告成順利出版。

凡是經過翻譯的任何一種宗教經典，其用辭均未免有些不達意之處。為使這本《新舊約聖經》的用辭更加完美，上述之各宣道會（加上加拿大長老教會差會）於1885年組織一個委員會，著手修改經典內容之文辭。並且選出馬雅各醫師為執行祕書，稍後由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接任。參與修改的貢獻者有：打馬字牧師，麥嘉湖牧師、汲禮蘭牧師（Rev. Leonard William Kip）、涂為霖牧師（Rev. William Thow）、倪為霖牧師（William Macgregor）、和甘為霖牧師（Rev. William Campbell），以及一些本地人助手。此一委員會於任務完成後，在1893年解散。<sup>14</sup>

就上面各段落的探討見之，「台語羅馬字」自1820年由麥都思牧師發明以後，已經不只是一種方言的「拼音」符號或音標，而是一種應用於讀寫之簡易「文字」。此一認知十分重要，往後之討論也足資證明其文字化角色。

## 二、社會教育之文字角色

自從羅馬拼音「廈門腔白話字」被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師引進斯土台灣以後，這種易學之簡易文字即普遍在基督徒當中流傳。他們充分地使用它來吟唱「聖詩」表達信仰感情，閱讀《新舊約聖經》，藉以認識「基督教」之教義。當代在台灣的宣教師因充分體會到這種羅馬拼音「白話字」之效用性，即開始計劃應用它做為從事社會教育之工具。結果便有下列之成果出現（按年代排列）：1885年巴克禮牧師創刊『台灣府城教會報』，1893年偕叡理牧師出版《中西字典》，1894年長榮中學創辦人余饒理校長出版《三字經新

14 見：Loc, cit。



撰白話註解》(中學教科書)，1913年甘為霖牧師出版《廈門音新字典》。從此這一「廈門腔白話字」之羅馬拼音「文字」，就在歷史上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也順理成章稱它為「台語羅馬字」。

### (一)『台灣府城教會報』之創刊

羅馬拼音「廈門腔白話字」《新舊約聖經》之監印者——馬雅各醫師(Dr. James L. Maxwell)，因為深深體會到利用這種易學易寫的羅馬拼音「白話字」從事於社會教育之重要性，就在1880年捐贈一部西式「印刷機」(包括鉛字與排字架共十一箱的印刷設備)給台灣教會。並且於是年就運抵台灣，可是卻沒有一個人會使用它。<sup>15</sup>1881年台南神學院創辦人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 D. D., 1848—1935)首次歸國渡假，旋即利用機會在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的一家印刷公司(Aird Coglill Co.)學習檢字排版技術。公司負責人也特地指派一位資深技師熱心地教導他，經過一段時日巴牧師終於學成。1884年1月，巴克禮牧師帶著一筆英國母會為台灣教區文教工作之捐款回到台南。他先是利用「新樓醫館」北角的房間充當機房，將尚未拆封的十一箱印刷設備開封，又設法將這具台灣第一部西式印刷機裝配起來。繼而在附近建造一座全新的印刷所，取名「聚珍堂」(「新樓書房」之前身)。1884年5月24日(即英國維多利亞女王誕辰紀念日)，「聚珍堂」印刷所正式開工，大樹腳人蘇沙(即出身高雄縣大樹鄉民)成為巴克禮牧師訓練的第一位技工，協助排版與印刷工作。蘇沙聰明過人，前後只花了三天三夜即學會「台語羅馬字」(白話字)。其後巴克禮牧師又派他前往中國汕頭學習一個月的印刷技術，而為「聚珍堂」的一位重要技師。由於他體弱多病，僅在「聚珍堂」工作三年，二十五

15 關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首任駐台宣教師馬雅各醫師(Dr. James L. Maxwell)之事跡，可參照：楊士養編，《信仰偉人列傳》，(台南：人光出版社，1989年)，pp.1-5。



歲即與世長辭。然而他對於『台灣府城教會報』這一份「台灣第一」的月刊之排版與印刷，其貢獻足以名留青史。<sup>16</sup>

清光緒十一年六月(1885年7月)，以羅馬字拼音「台語白話字」為「文字」的『台灣府城教會報』從「聚珍堂」發行，成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上第一份社會教育之傳播媒體。這份月刊的第一號只有四頁，第二號開始就擴大到八頁，此後一直延續到日本領台時期。1905年更名為『台南教會報』，並經台灣總督府核准發行。1913年9月又改名『台灣教會報』。後來又與北部中會的『芥菜子報』、台中中會的『福音報』及高雄中會的『教會新報』合刊，因此於1932年易名為『台灣教會公報』(Taiwan Church News)迄今。二次大戰期間的1942年3月，日本政府下令停刊『台灣教會公報』(停刊那期為684號)。戰後又於1945年12月復刊。1969年3月正式以半月刊發行。可惜於1970年1月全部改由「漢文」發報，又改為週刊，「台語羅馬字」從此在長老教會中逐漸沒落。<sup>17</sup>

值得注意的是：1885年7月12日『台灣府城教會報』創刊時，滿清駐台巡撫劉銘傳也發行官方的漢文公報——『邸報』。可是官方之公報，對於台灣的社會教育根本影響不大。根據『台灣府城教會報』，創刊者巴克禮牧師於「創刊號」書信式的社論所示，已經充分指出「白話字」(羅馬拼音文字)之重要性(下列文字之原文即「白話字」)：<sup>18</sup>

“台灣府城的教師問教會內的兄弟姊妹平安，願上帝賞賜您大家大恩典。

阮過來這邊是因為愛傳天國的道理，使人識上帝來得著救。所傳的道理攏是聖冊所教示的。若不是聖冊的道理，阮不敢講。所以阮沓沓苦勸您

16 見：莊永明，《台灣第一》(2)，台北。文鏡文化公司〔文鏡叢書，10〕，pp.45-54，〈第一台新式印刷機——「聚珍堂」印刷機〉條目。

17 見：賴永祥，Op, cit, pp.17-19，〈台灣教會公報〉條目。

18 見：Ibid, p.19。



著讀冊來看聖經，盼望您愈久愈識上帝的道理，也毋免的確倚靠牧師或是傳道理的人來講道理給您聽。因為您本身看聖冊，信聖神的感化，雖然無人來教示，您還可會知上帝的旨意。可惜您本國的字真難，少人看會曉得。所以阮有設別物的法度，用「白話字」來印冊，使您眾人看卡快識。也近來在這個府城阮有設一個印冊的器具，通印字親像這號的款式。今阮盼望您眾人欲出力學這些「白話字」，後來阮若印什麼冊您攏會曉得看。人不可打算因為他識「孔子字」（譯者註：指「漢文」），所以毋免學這號的字。也不可看輕它，講是囡仔所讀的。兩樣的字攏有路用，不過因為這號卡快也卡明，所以人著大先讀它。後來若欲續讀「孔子字」是真好，總是「白話字」著卡大先，驚了若不讀，您不曉得看阮別日所印的。所以阮苦勸您眾人，入教以及聽道理的人，男婦老幼、識字不識字的人攏總著緊緊來學。親像按呢，您就會曉得讀這號的「教會報」及外冊與聖冊。盼望您的道理愈深，您的德行愈齊備。”

從上面的這段社論，就可以體會當代長老教會宣教師推廣「白話字」之盡力與用心。包括鼓勵識字及不識字者，都要學習這種羅馬拼音文字——「白話字」。

## (二) 偕叡理的《中西字典》

台灣歷史上最早以「台語羅馬字」（白話字）標音的「漢字」字典，首推偕叡理牧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 - 1901）編輯，並出版於1893年的《中西字典》（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the Formosan Vernacular, 1893）。這本字典原於1874年便由偕叡理牧師（通稱「馬偕博士」）編輯完稿，它係依照上海「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的「漢字」字表部首及字劃編排而成，計收錄6,664字，厚達



226頁。<sup>19</sup> 偕叡理牧師自述其編輯這本漢羅文字對照字典之目的，係一面自己學習，另面在教導其門人（要求門人一天抄寫及背念一百個「漢字」）識字。後來經過門人一再要求出版，偕叡理牧師即指派門人劉澄清將「漢字」按其部首與字劃編列，嚴彰負責用羅馬字標音及解釋字義，汪式金加以抄寫。字典內容採取衛三畏牧師（Rev. Samuel Wells Williams）的《漢英韻府》（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4）所列出的漢字，又增加一些漢文版《新舊約聖經》的專用字。<sup>20</sup>

關於《中西字典》在上海監印之情形，就是由嚴彰（1869 - 1939，他是嚴清華牧師之弟）與蔡生這兩位偕叡理牧師的門人所負責的。他們兩人在上海停留三個月，於1891年8月才搭乘「密士號」輪船返回淡水<sup>21</sup>。這本字典於1893年正式出版發行之後，流傳並不太廣（僅在北部長老會教傳教師、馬偕門人、與少數基督徒當中流傳）。這本已絕版很久的《中西字典》，台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有收藏一冊，誠屬難得。

### （三）余饒理的《三字經新撰白話註解》

世傳宋代王應麟所撰的《三字經》，可以說是昔日台灣兒童必讀之「漢文」初學課本。<sup>22</sup> 1885年創設台南市「長榮中學」的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首任「教育宣教師」余饒理先生（Mr. George Ede, 1855-1905）<sup>23</sup>，眼見當代台

19 見：Ibid, p.67，〈馬偕「中西字典」〉條目。

20 見：Ibid, pp.67 - 68，〈馬偕「中西字典」〉條目。

21 賴永祥引自嚴彰的《マツカイ博士の業績》，pp.132 - 133。見：賴永祥，Op. cit. pp.68，〈馬偕「中西字典」〉條目。

22 昔日台灣兒童的「漢文」初學課本尚有：《幼學瓊林》與《千字文》。

23 余饒理先生（Mr. George Ede）於1882年偕夫人來台擔任「教育宣教師」，1885年創設台灣第一所西式中學——「長榮中學」。在台工作前後十三年之久，1896年因夫人體弱多病而轉赴廣東的五經富客家庄服務。他除了著作《三字經新撰白話註解》一書外，也以羅馬拼音「白話字」，著有：《聖道問答》（SÈNG TŌ BŪN-TAP, 1884）、《萬國記錄》（BĀN-KOK KÌ-LIOK, 1887）、



灣兒童均在背誦《三字經》為學習「漢文」之入門，認為有必要用羅馬拼音「白話字」加以標音與註解來做為中學生之「漢文課本」。經他用心撰述，於1894年完成這本：《三字經新撰白話註解》（SAM-JŪ-KENG SIN-CHOĀN PĒK-OĀ CHŪ-KÁI, 1894）。該書由台南府城「聚珍堂」（後來的「新樓書房」）出版，初版出書八百本。1904年再版兩千本，頁數為179頁。<sup>24</sup>此書早已絕版，但有一位愛好台灣文化的駐台日本基督徒商人（任職於「丸紅商社」），三田裕次先生於1987年出資重印350冊贈送給台灣學者。因索取者眾，又於1989年再印300冊。<sup>25</sup>筆者曾經於1987年以三尊台灣神像換得該書五十冊轉贈給當時學習「台語羅馬字」的台灣神學院神學生，一時如獲珍寶。令人汗顏的是，台灣的富豪比比皆是，長老教會人士也對它視若無睹，明顯忽視台灣文化及自己史料之保存，反而由一位日本商人去關心自己的文獻及重印它，夫復何言？

#### (四)甘為霖的《廈門音新字典》

十九世紀時代台灣的漢人（客家人除外），均操著泉州腔與漳州腔閩南語合參的「台灣話」（台灣化福佬話）。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師甘為霖牧師（Rev. William Campbell, 1841 - 1921）有鑑於此，即著手編輯一本適用於台灣社會場合的羅馬拼音「白話字」與「漢字」對照之字典，來協助當

及《中國歷代誌略》（TIONG-KOK LEK-TĀI CHÌ-LIOK, 1890）三書。參照：楊士養，《信仰偉人列傳》，前引書，pp.203 - 205。

24 見：賴永祥，《教會史話》〔四〕，（台南：人光出版社，1998年），pp.30 - 32，〈余饒理三字經註解〉條目。

25 三田裕次先生不僅出資重印余饒理的《三字經新撰白話註解》一書，更自掏腰包重印甘為霖牧師（Rev. William Campbell, D.D.）研究十七世紀荷蘭治下的台灣重要史料：《Formosa Under the Dutch》（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03）一書，贈送給有心研究「台灣史」之學者。兩書皆由台北市「南天書局」出版。關於三田裕次先生所收藏之文獻，可參考：張炎憲編，《台灣古文書集》，（台北：南天書局，1988年）一書。



代在台宣教師以及基督徒學習「台灣話」。1913年這本：《廈門音新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Chew, Chiang-chew and Formosa, 1913）就此出版問世。<sup>26</sup>有關這本字典（後被簡稱「甘字典」）之編輯，主要係參考《康熙字典》，打馬字牧師（Rev. J. van Nest Talmage）的《廈門音的字典》與「十五音」而成，字數為一萬五千字。同時得力於兩位長榮中學畢業生：林錦生（1907年畢業，後為醫師）與陳大鑼1910年畢業，後任中學教員）之協助，才得以完成。<sup>27</sup>我們從甘為霖牧師的字典「頭緒」（用白話字書寫）內容，也可知道他編輯這本字典之目的：

“本字典也是《聖經》土音的樣，因為「漳、泉、台」雖然有多多腔，咱欲印冊，自然著隨彼號卡通行的土音，續給人讀的時掙出在他來呼。……我四十餘年前到台灣之時，攏無這號的字典，也攏無知影的先生在的；所以我緊緊出力，大盼望這字典會幫助多多人識字才卡會曉本份。

因為台灣教會屬的學生林君錦生以及陳君大鑼與我同做這個工程，咱著給伊說多謝。”

至於「甘字典」之優點，就是可依照「白話字」字母之排列去尋找，來使人認識「漢字」，註釋又相當簡明。因此從1913年出版迄今，依舊很受歡迎。甘牧師於1921年去世，1924年由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監

26 見：賴永祥，《教會史話》[一]，Op. cit. pp.95 - 98，〈廈門音新字典〉條目。also cf. William Campbell, 《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 - Chew, Chiang - Chew and Formosa》，（1913）,Its "Preface" and "Thâu - sū"。按甘為霖牧師（也是榮譽神學博士）著作等身，更是台灣盲人福利之父及澎湖傳教之先驅。關於其學術貢獻可參考：賴永祥，《教會史話》[一]，Op. cit. pp.107 - 109，〈甘為霖著作等身〉條目，從pp.110 - 142也都是作者根據甘著所作之敘述。

27 關於林錦生與陳大鑼這兩位《廈門音新字典》（甘字典）貢獻者之記事，可見之於：賴永祥，《教會史話》[一]，op. cit. pp.99 - 101，〈書序有名陳大鑼〉條目，及pp.159 - 161，〈林錦生與甘字典〉條目。



印發行第二版，因此多了一篇巴牧師的序言。1918年日本天理大學教授村上嘉英編輯的《現代閩南語辭典》及1982年中國廈門大學所編輯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辭典》，也都參考這本「甘字典」的內容。<sup>28</sup>由此可見其在歷史上影響之深遠。

從上面的探討就可以發現，羅馬拼音「台語白話字」的文字化成果：不但促使亞洲最早的民間月刊——『台灣府城教會報』之發行，也有台灣北部宣教先驅偕叡理牧師的《中西字典》（1893年）、台灣府城「長老教中學」（長榮中學前身）創辦人余饒理先生的《三字經新撰白話註解》（1894年）、及台灣盲人福利之父甘為霖牧師<sup>29</sup>的《廈門音新字典》（1913年）這些重要的教科書與字典出現。而它們對於當代台灣社會教育之貢獻及影響，不但相當深遠，更有其不可磨滅之歷史定位。

### 三、促進台灣現代化之貢獻

台灣於日本帝國統治下的二十世紀初期，國民教育仍然不十分普及，因此斯土的社會大眾絕大多數均為不識字的文盲。這種情形不但使當代的長老教會宣教師積極推動「台語羅馬字」於社會教育，更使基督徒知識分子參與推動這種容易學習的「白話字」，相信它能夠促進台灣社會加快腳步走向現代化。憑著此一理想與展望所出現的重要文獻，有1917年台灣癲瘋救濟之父戴仁壽醫師（Dr. George Gushue-Taylor）所著作的《LĀI-GŌA-KHO KHĀN-HŌ-HĀK》（《內外科看護學》，1917年），台灣文化協會會員蔡培火先生著作的《CHĀP-HĀNG KOÁN-KIĀN》（《十項管見》，1925年），以及台南

28 見：賴永祥，《教會史話》[一]，Op. cit. pp.95 - 98,〈廈門音新字典〉條目。

29 見：Ibid, pp.211 - 216,〈盲人事工的發軔〉及〈設「訓瞽堂」在洪公祠〉條目。



市名醫顏振聲醫師著作的台灣第一本西醫醫療史——《LÂM-PŌ KÀU-HŌE I-LIÂU THOÂN-TŌ-SÚ》（《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1942年）。而這些寶貴之文獻，都是當代台灣社會受到西方文化（西式醫療技術及民主政治）之影響，因此可以說是斯土台灣走向「現代化」的珍貴史料。

### （一）戴仁壽的《內外科看護學》

台灣社會西式醫療技術之引進，係隨著十九世紀中葉蘇格蘭與加拿大長老教會的宣教運動而來。1865年英國蘇格蘭長老教會派駐台灣宣教的首位宣教師馬雅各醫師（Dr. James L. Maxwell, 1836-1921，其駐台期間自1865年至1885年），就是一位內外科的全科醫師。他也是西式醫療技術之引進者，台灣首座西式醫院「新樓醫館」便是由他所手創。<sup>30</sup>由於他對於「醫療傳道」之啟蒙，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師偕叡理牧師（Rev. George L. Mackay）也在淡水開設「偕醫館」來嘉惠台灣北部地區民眾。<sup>31</sup>其時日本帝國尚未領台，長老教會的宣教醫師就在這些初期的西式醫館中訓練本地醫療人員，使台灣的醫療技術與西方世界接軌。日本帝國治台後的二十世紀初，「彰化醫館」（其前身為「大社醫館」）與「馬偕醫館」（不同於淡水「偕醫館」）分別於中部彰化與北部的台北創立。而更多的本地醫療人員，都從這些長老教會醫館被訓練出來。1911年來自加拿大的宣教醫師戴仁壽（Dr. George Gushue-Taylor, 1883 - 1954）受英國長老教會派遣，接任台南「新樓醫館」為第四任院

30 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1965年），pp.6 - 8、pp.24 - 27。又見：賴永祥，《教會史話》[一]，Op. cit. pp.281 - 282，〈指向台灣府城〉條目。

31 淡水「偕醫館」（Mackay Hospital）係偕叡理牧師接受一位馬偕船長夫人（Mr. Mackay）三千美金的奉獻所建設者，時在1880年。cf. George Leslie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edited by Rev. J.A. MacDonal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896。pp.308 - 317。



長，其夫人也擔任護士長。他為了強化醫館的護理教育，便利用空餘時間以「白話字」（台語羅馬字）寫了一本在當代最重要的醫療文獻：《內外科看護學》（LĀI-GŌA-KHO KHÀN-HŌ-HĀK），其英文書名為《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ursing: Designed for the Use of Nurses Reading Amoy Vernacular Chinese》，並於1917年出版。<sup>32</sup> 這本在當代台灣可以說是最有價值的「看護婦」（護士）訓練教科書，全書厚達675頁。從資料之搜集、繪圖與製表，均由戴醫師一手包辦。戴仁壽醫師來台不到六年就能夠在百忙中用「白話字」撰寫這本內外科護理的教科書，委實令後人萬分佩服。他在這本教科書的「白話字頭序」（也附有一篇「英文序言」），有提到撰述之目的：

“備辦這本冊目的，是欲做三等的人之路用：頭一等號是有病的人，盼望伊的艱苦會卡輕；第二等是台灣人與在別位會曉讀廈門腔（指「白話字」）的人，盼望伊對所讀的會卡賢看護病人，也自己會卡毋免著破病；第三等是外國宣教師。”又說：

“有附圖幾若百個，因為打算人若干礁讀冊，意思豈採不明。總是若有圖可看，彼個見識會對目調入，一看就知意思。總是卡要緊的，著斟酌看圖的說明與冊對照，到意思攏瞭解，才卡有利益。……”。

本書一出版，的確成為當代南北「長老教醫館」護理人員的一本最重要教科書。可惜二次大戰之後看懂「台語羅馬字」的人甚少，因而逐漸失傳。此外，戴仁壽醫師也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他於1934年在台北縣八里坌（現在的八里鄉）建設一座專門收容癲瘋病患者的「樂山園」（Ngâu-San-Oân），因而被譽為「台灣癲瘋救濟之父」。<sup>33</sup>

32 cf. George Gushue-Taylor,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ursing》（LĀI GŌA KHO KHÀN-HŌ-HĀK），Yokohama, Tokyo and Kobe: The Fukuin Printing Co., Ltd, 1917。

33 見：董芳苑，〈台灣癲瘋救濟之父—戴仁壽博士〉，發表於：國史館主辦之「二十世紀台灣歷史



## (二)蔡培火的《十項管見》

1921年（大正十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這個對抗日本帝國殖民主義的組織，以台中望族林獻堂先生為總理（盟主），蔡培火先生這位留日的基督徒是該協會的重要幹部之一。<sup>34</sup>當時蔡培火先生眼見台灣人絕大數為文盲，因為“無讀冊”以致“頭腦不飽填”，不知自己在日本帝國治下之「二等國民」處境。於是和幾位同志研討，其結論是：台灣人只有學習長老教會使用的「台語羅馬字」（白話字），才容易吸收知識，培養學問。因為要求台灣人去學習「漢文」再來追求學問，既非常困難又時間太長。於是他從1923年（大正十二年）10月開始，用「台語羅馬字」撰寫一本教育台灣人頭腦開竅的《十項管見》（CHAP-HĀNG-KOÁN-KIÀN）。這本書於一年後完成，1925年由長老教會「台南新樓冊房」印刷出版。<sup>35</sup>作者特別在該書的「第二項管見」，論及〈新台灣與羅馬字的關係〉。其中內容特別強調：「台語羅馬字」需要普及於台灣社會中，因為這種拼音文字非常容易學習。作者提到當代三百六十萬台灣人當中，差不多只有二十萬人讀書識字。而且二、三十歲以上的男女，不識字的文盲比比皆是。所以大家應該趕緊學習「台語羅馬字」，以期台灣人更有知識，才不致陷於精神上的飢餓。<sup>36</sup>畢竟「新台

與人物學術討論會」），2001年（民國九十年）10月23日至24日。又參照：台北縣私立樂山療養院創立五十週年紀念冊，《樂山五十》，1984年3月30日發刊。

34 見：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王詩琅譯，（台北：稻香出版社，民國77年），pp.249ff。其中pp.257-258「台灣文化協會主要幹部與會員」之表格內註八六載：“蔡培火，原籍北港，後遷台南市。台灣反日政治、文化啟蒙運動右派重要角色，詳本書各章。戰時於東京開餐館，旋赴滬。……後歷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委員，行政院政務委員等。”

35 見：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五]：《台灣語言相關資料》，上冊，（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0年）全書。書中頁6至頁174為《十項管見》（CHAP-HĀNG KOÁN-KIÀN, 1925）一書之「台語羅馬字」原文，自頁176至頁318為董芳苑的「漢文」（台語體）譯文。

36 見：Ibid, pp.189-199，第2項，〈新台灣與羅馬字的關係〉這一段落。



灣」的建立，台灣人的人品必須由識字及讀寫開始。

蔡培火先生為要推廣「台語羅馬字」，更因此編著一冊《白話字課本》（PEH-OĒ-JĪ KHÒ-PÚN）。<sup>37</sup>有趣的是：他稍後又自創一套類似日語「片假名」的「台語白話字」拼音法，並且親自施教。同時也出版其《新式台灣白話字課本》之小冊。<sup>38</sup>只是這一拼音式「台語」並不普及，因為其標音有些複雜又難學。由此足見，蔡培火先生對於鼓勵當代台灣人識字讀書之用心。當然他以「台語羅馬字」寫作來教育台灣人之代表作，就是這本《十項管見》遺作。筆者在國小三年級（九歲時）時，就念過這本以「台灣地圖」為封面的當代暢銷書，只是內容還不十瞭解而已。無論如何，《十項管見》這本以「台語羅馬字」所寫成的書，在當代的台灣社會相當受注目，也深具影響力。它對於啟蒙台灣人的民族意識與國際觀，委實有很大的貢獻。

### （三）顏振聲的《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

台灣第一部有系統記述西醫的「醫學史」，就是用「台語羅馬字」（白話字）著作的，其書名叫做：《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LÂM-PŌ KÀU-HŌE I-LIÂU THOÂN-TŌ-SÚ）。作者顏振聲醫師（1876 - 1949）為台南市名醫，因醫德昭彰又平易近人，人人都稱呼他「加齡仙」。根據台灣教會史家賴永祥教授：〈台灣基督教會醫學史〉一文所介紹〔收錄於《教會史話》（一），pp. 23 - 25〕，顏醫師的父親為顏永成、母親洪仙河（永嬭）。他於年輕時在台南「新樓教會書房」學習印刷，曾經寄居在高長伯（十九世紀最早的四位基督徒之一，後來成為傳道師，為高俊明牧師祖父）家中，因此篤信基督教。之

37 見：Ibid，〈台灣語言相關資料〉，下冊，pp.8 - 22〈白話字課本〉（羅馬字體拼音）。

38 見：Ibid，〈台灣語言相關資料〉，下冊，pp.24 - 44〈新式台灣白話字課本〉（日式片假名體拼音）。



後進入「大學」（台南神學校）準備獻身為傳道。畢業後又在「新樓醫館」跟隨金醫師（Dr. William Murray Cairns）習醫。1895年日本領台之時金醫師回國避難，待時勢穩定之後他又跟隨蘭大關醫師（Dr. David Landsborough, 1870 - 1957）轉赴當時新開設的「彰化醫館」習醫。學成之後回到台南市開業，其診所名為「愛育堂」。1942年至1944年戰時期間他擔任「新樓病院」院長，也於長老教會所屬的台南市「太平境教會」擔任過「執事」（1900-1907）與「長老」（1907 - 1946）。<sup>39</sup>

這本用「台語羅馬字」寫成的《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先由顏醫師陸續發表於『台灣教會公報』。其連載期數前前後後達十三期：663期至668期，670期至672期，674期至677期，時間自1940年6月至1941年4月。內容詳述從1865年馬雅各醫師（Dr. James L. Maxwell）來台醫療佈教，以及後繼者及他們如何設置醫館之情形。所介紹的長老教醫館有：打狗「旗後醫館」、台南「舊樓醫館」、「新樓醫館」、「女界醫療傳道」、「大社醫館」、以及「彰化醫館」等等。因為是名符其實的台灣南部蘇格蘭長老教會宣教區醫療傳道之歷史及其醫館之介紹，所以不包括北部加拿大長老教會宣教區屬下的淡水「偕醫館」。究其特色，除了介紹各地醫館「宣教醫師」之事跡外，也列述那些跟隨「宣教醫師」學醫的本地人事跡。因此前台灣大學圖書館長賴永祥教授評論這本書為：“一本說明台灣西洋醫學黎明期的良書，是本島第一部有系統的醫學史。”<sup>40</sup> 1942年台南「新樓教會書房」（台灣教會公報社）將顏醫師大作出版，定名為《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總共51頁）。可惜這本用「白話字」寫成的佳作於戰後即告絕版，後經台灣大學醫學院教授及前高雄醫學院創辦人及院長杜聰明博士（1893 - 1986），於廿世紀六〇年代委

39 見：賴永祥，《教會史話》[一]，pp.23 - 25，〈台灣基督教會醫學史〉條目。

40 見：Ibid, p.24。



請黃主義牧師與張榮宗先生將其譯成「漢文」，並且加上馬偕博士之子偕叡廉牧師（Rev. George William Mackay, 1882 - 1963）對淡水「偕醫館」之口述歷史。<sup>41</sup> 之後以〈台灣基督教會醫學史〉為題，發表於1963年2月那一期的『台灣醫學會雜誌』（第六十九卷第二號）。該文又被收錄於：《杜聰明言論集》（第二輯），頁541至頁562之內。

綜觀上面這一段落所探討之三本著作：戴仁壽博士的《LĀI-GŌA-KHO KHĀN-HŌ-HĀK》（內外科看護學）、蔡培火先生的《CHĀP-HĀNG KOÁN-KIĀN》（十項管見）、及顏振聲醫師的《LĀM-PŌ KĀU-HŌE I-LIĀU-THOĀN-TŌ-SÚ》（南部教會醫療傳道史），可以說都是影響台灣歷史又促進台灣社會現代化的重要著作。最難能可貴的是其所使用的文字並非「漢文」，而是道道地地的「台語羅馬字」（白話字）。由此可見，這種「羅馬字拼音」的「簡易文字」，既然已在斯土台灣流傳一個多世紀，自然可以說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其歷史定位甚為清楚。<sup>42</sup>

41 關於馬偕博士獨子偕叡廉牧師（Rev. George William Mackay）之介紹，可見之於楊士養著，《信仰偉人列傳》，前引書，pp.237 - 239。

42 如果追述台灣歷史，這種羅馬字拼音的「白話字」早在公元十七世紀就被「荷蘭歸正教會」（Dutch Reformed Church）宣教師應用於所謂「新港七社」的平埔族原住民方言之中。就像1661年荷蘭歸正教會宣教師倪但理牧師（Rev. Daniel Gravius），就出版過「新港語」的《馬太福音書》。十七世紀以後所出現的「新港文書」（番仔契）這類漢番土地交易的契約文件，就是羅馬字拼音的「新港語白話字」與「漢文」對照之文件。所以說，「台語羅馬字」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委實言不為過。cf,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03），pp.89ff, Part Second: Notices of Church Work in Formosa。又參照：賴永祥，《教會史話》[一]，Op. cit. pp.111 - 113〈荷蘭台灣宣教史的開拓〉條目，pp. 121 - 123〈荷人羅馬字番話文獻〉條目，及pp.125 - 127〈新港文書〉條目。



## 結語：保存與推廣文字化的「台語羅馬字」

就上面所論有關「台語羅馬字」文字化歷史定位的三個大段落：一、「文字化之歷史發展過程」，二、「社會教育之文字角色」，及三、「促進台灣社會現代化」的探討，已經可以清楚認識它不只是一種台灣的「音標」而已，應該說是一種具社會教育功能之「簡易文字」（語文）。最具價值者，就是「台語羅馬字」因為易學又實用，因此昔日西方的基督教宣教師為它編輯「字典」，用它來發行月刊及著作書籍。它不但在長老教會內部流通，也被民主運動的知識分子用於社會教育。並且成效十分顯著，長久以來已經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sup>43</sup>可惜這一簡易的「台語羅馬字」自廿世紀七〇年代以後，因國內教育普及，「漢文」讀寫者眾，以致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摒棄。以為大家都能夠讀寫「漢文」了，何須再使用「台語羅馬字」（白話字）來發行『台灣教會公報』。因此就連以「台語羅馬字」（白話字）起家的『台灣教會公報』也都全版漢字化，委實十分可惜！如此情形，連關心台灣語文的學者都十分無奈與感嘆。就像國立新竹師範大學台語研究所的董忠司教授，便語重的問過筆者：為什麼長老教會的『台灣教會公報』不保留一、兩頁的「台語羅馬字」版面，來維持它原來之精神與特色呢？既然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都忽略「台語羅馬字」（白話字）的「文字化」精神，眼見「TLPA」與「

43 就像應用這種「台語羅馬字」（白話字）於「文藝」方面來寫作台灣小說的實例，有：賴仁聲牧師的《ÁN-NĪA Ê BAK-SÁI》（阿娘的目屎，1924年）、《KHÓ-ÀI Ê SĪU-JĪN》（可愛的仇人，1970年），以及鄭溪泮牧師的《CHHUT-SÍ-SÒA<sup>n</sup>》（出死線，1926年）。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台語羅馬字」為主所出現的字典與工具書也為數不少，其中比較凸出者有美國天主教台中「馬利諾會」語言中心（Maryknoll Language Service Center）的《Amoy-English Dictionary》（1979）與《English-Amoy Dictionary》（1979），Bernard L.M. Embree的《A Dictionary of Southern Min》（Hong Kong Language Institute, 1973），日本天理教大學教授村上嘉英編著的《現代閩南語辭典》（日本奈良：天理大學出版部，1981年），陳修編著的《台灣話大辭典》（台北：遠流出版社），及胡鑫麟編著的《實用台語小字典》（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4年）等等。



通用」音標快要取代它之際，單單有數萬人的「簽名」要去強調其重要性及音標使用之歷史性，到底有什麼用？筆者身為長老教會的一員，面對這類問題也只能啞口與無奈。事實上全國長老教會除了十多族原住民教會尚在積極使用「羅馬字」為文字在他們的母語教學外，其他絕大多數講「福佬話」台語的教會都已經不去推廣，因此能夠看懂「台語羅馬字」（白話字）《新舊約聖經》的信徒已經寥寥無幾。時下為何此一「台語羅馬字」（白話字）會被學界重新提起又再次被台灣社會所重視呢？原因不在於它「文字化」之重要性及歷史性，而是「母語」拼音字母所引發的「音標」問題。這兩年來，台灣國內國民教育已經逐漸走向「本土化」，教育部推廣「鄉土語言」（母語）教學於九年一貫國民教育（國小六年至國中三年）之中。因此「母語」教學的「拼音文字」（音標）紛紛出籠，並且均以「本位主義」立場去強調自己的那一套最好。這種情形大家都看在眼裡，因此也造成母言教師之好惡取捨問題以及教學上之混亂局面。

講到「鄉土語言」（母語）的拼音問題，明顯地非常複雜，而且「台語」（福佬話）之「音標」，甚至多到四十種以上(如前所提及的)。不過兩、三年來出現於國民小學與中學的鄉土語言教學課本，最受普遍接受與應用者有「TLPA」、「通用」，以及「台語羅馬字」等三種音標。目前台灣客家母語之拼音已經正式採用「通用字母」音標，台灣原住民母語教學則多採用「教會羅馬字」（已經文字化）。唯有台灣福老語教學所採用的音標最為混亂，除了上列三種標音法以外，也應用其他音標（諸如ㄅㄆㄇㄈ注音符號）從事母語教學。然而本文之主旨不在於處理有關「鄉土語言」（母語）教學之「音標」字母使用的問題，而是在於提醒斯土有志於保存「母語」的同道正視「台語羅馬字」（白話字）的歷史定位問題。也就是說，「台語羅馬字」（白話字）不可被貶低為一種「鄉土語言」（母語）教學的「注音符號」（音標）而已，，必須重視它為一種長久以來從事斯土社會教育的重要「文字」。它既



有「字典」及「辭典」之工具書，更是刊物及書籍之「語文」。所以其在歷史上的文化角色，絕非「TLPA音標」、「通用音標」，以及其他的母語音標符號可以相比。為此，學界的時代使命不僅是保存「台語羅馬字」（白話字）而已，更要有效地將其推廣使用，使它成為一種社教性文字，使優美的「台灣文化」（因為「台語羅馬字」已經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得以永久保存。期待台灣全國的兒童及青少年要開始學習「台語羅馬字」（白話字），使此一與「台灣文化」有關之語文能夠發揚光大。

另外必須在此強調的，就是「台語羅馬字」不但早就與國際社會接軌，也已經在美國知名大學正式成為研究所之重要課程之一。就其與國際社會接軌之事實而論，這一羅馬字拼音的「閩南語文」遠自十九世紀就在菲立賓、馬來亞、新嘉坡、泰國等華人僑居地區流行。尤其是這些地區的基督徒所使用的《新舊約聖經》與禮拜用的《聖詩》歌本，均是這類羅馬字拼音的「閩南語文」，時至今日尚在使用。至於在東北亞地區使用之實例，可見之於日本天理大學教授所編著的：《現代閩南語辭典》（日本奈良：天理大學出版部，1981年）一書。<sup>44</sup>這本辭典可以說是時下日本人學習台語之重要文獻，所以可凸顯日本學者對於「台語羅馬字」之重視。至於近年來美國知名大學成立「台灣語文研究所」之實例，至少也有下列四所：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賓夕凡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及夏威夷大學（Hawaii University）等等。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些知名的美國大學「台灣語文研究所」，都是採用「台語羅馬字」從事教學研究。由此足見「台語羅馬字」在國際學界之重要性，它絕對不是「TLPA」與「通用」之拼音字母所能夠取代的。因此「台語

44 參照村上嘉英編著，《現代閩南語辭典》，（日本奈良：天理大學出版部1981年）一書。該書就是以「台語羅馬字」來編輯的。



羅馬字」從歷史定位來看，不管是它的「文字化」事實及對於促進「台灣現代化」之影響，以至已經被國際社會接受這點，都必須致力加以推廣與保存。

2004年1月11日  
重新增補於淡水河畔寒宅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I,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BY  
REV. CARSTAIRS DOUGLAS, M.A., LL.D. Glasg.,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

NEW EDITION,  
WITH CORRECTIONS BY THE AUTHOR.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14 PATERNOSTER SQUARE.  
1899.

*All rights reserved.*

臺海文獻

第五十五卷第二期

杜嘉德牧師的《廈門音字典》內頁



# TÀI-OÂN-HÚ-SIÂN<sup>N</sup> KÀU-HŌE-PÒ.

TE IT TIU

KONG-SŪ XI nī, 6 goéh.

~\*~\*~

Tài-oân-hú-siā<sup>n</sup> ê Kàu-su m̄ng Kàu-hōe-lâi ê hia<sup>n</sup>-tī chí-moāi<sup>n</sup> pêng-an :  
Goân Siōng-tè siú<sup>n</sup>-sù lín tãi-ké tōa in-tián.

Goân kòe-lâi chit-pêng sī in-ūi ài thoan Thian-kok ê tō-lí, hō<sup>n</sup> lāng bat Siōng-tè lâi tit-tiōh klu. Sô<sup>n</sup> thoan ê tō-lí lóng sī Seng-chheh só<sup>n</sup> kà-sī-ê; nā<sup>n</sup> m̄-sī Seng-chheh ê tō-lí, goân m̄-ká<sup>n</sup> kóng. Sô<sup>n</sup>-í goân taùh-taùh khó<sup>n</sup>-khò<sup>n</sup> lín tiōh thák-chheh lâi khòa<sup>n</sup> Seng-keng, òng-bāng lín ná<sup>n</sup>-kú ná<sup>n</sup>-bat Siōng-tè ê tō-lí; iā m̄-bián tek-khak oá-khò<sup>n</sup> Bók-su á-sī Thoan-tō-lí ê lāng lâi kóng tō-lí hō<sup>n</sup> lín thia<sup>n</sup>; in-ūi lín pún-sin khòa<sup>n</sup> Seng-chheh, siū Seng-sin ê kám-hòa, sui-jián bô<sup>n</sup> lāng lâi kà-sī, lín iáu kú ē chái Siōng-tè ê chí-l. Khó<sup>n</sup>-siōh lín pún-kok ê jī chin oh, chíó chíó lāng khòa<sup>n</sup> ē hiáu--tit. Sô<sup>n</sup>-í goân ū siat pát-mih ê hoat-tō, ēng pēh-oē-jī lâi in-chheh, hō<sup>n</sup> lín cheng-lāng khòa<sup>n</sup> khah khoài bat. Iā kīn-lâi tī chit-ê Hú-siā<sup>n</sup> goân ū siat chit-ê in-chheh ê khi<sup>n</sup>-khū, thang in-jī chhin-chhiū<sup>n</sup> chit hō<sup>n</sup> ê khoán-sit. Ta<sup>n</sup> goân òng-bāng lín cheng-lāng beh chhut-lát òh chia<sup>n</sup>-ê pēh-oē-jī; aū-lâi goân nā<sup>n</sup> in sím-mih chheh lín lóng ē hiáu--tit khòa<sup>n</sup>. Lāng m̄-thang phah-sùg in-ūi i bat Khóng-chú-jī só<sup>n</sup> i m̄-bián òh chit-hō<sup>n</sup> ê jī; iā m̄-thang khòa<sup>n</sup>-khin i, kóng sī gín-á só<sup>n</sup> thák--ê. Nng-iū<sup>n</sup> ê jī lóng ū lō<sup>n</sup>-ēng; put-kò in-ūi chit-hō<sup>n</sup> khah-khoài iā khah-bēng, só<sup>n</sup>-í lāng tiōh tãi-seng thák-i. Aū-lâi nā<sup>n</sup> beh sòa thák Khóng-chú-jī sī chin hó; chóng-sī pēh-oē-jī tiōh khah tãi-seng, kia<sup>n</sup>-liáu nā<sup>n</sup> m̄-thák, lín bē hiáu--tit khòa<sup>n</sup> goân pát-jit só<sup>n</sup> in--ê. Sô<sup>n</sup>-í goân khó<sup>n</sup>-khò<sup>n</sup> lín cheng-lāng; jip-kàu í-kip thia<sup>n</sup> tō-lí ê lāng, lâm-hū ló-iū, bat-jī, m̄-bat-jī ê lāng lóng-chóng tiōh kín-kín lâi òh. Chhin-chhiū<sup>n</sup> án-ni lín chiū ē hiáu--tit thák chit-hō<sup>n</sup> ê Kàu-hōe-pò kap gōa-chheh kap Seng-chheh; òng-bāng lín-ê tō-lí ná<sup>n</sup>-chhim, lín-ê tek-hēng ná<sup>n</sup>-chiáu-p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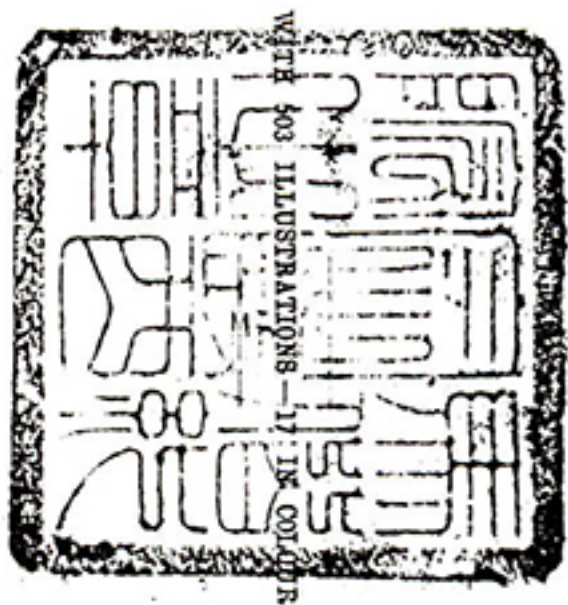


#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URSING

DESIGNED FOR THE USE OF NURSES READING  
ANY VERNACULAR CHINESE

BY  
G. GUSHUE-TAYLOR

M.B. (Honours), B.S. (London), M.R.C.S., L.R.C.P.  
MISSIO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TAIWAN, FORMOSA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HOSPITAL

1917

[ALL RIGHTS RESERVED]

LAI GŌA KHO  
KHÂN-HŌ-HÀK

譯者  
TIE JIN-SIU

總發行  
SUI TO-17 O SEN-E

YALOAN, TAI-LAN  
KLTON TŪS-LO KAU PI-PI  
Tai-chang 6 ni



三字經

新撰白話

註解

在臺南府城印

1904

SAM-JÜ-KENG

SIN-CHOÀN PÈK-ÒA

CHÜ-KÁI.

Y Jiau-li choän.

TÍ TÁI-LAM-HÜ-SIÄ. IN

1904

長榮中學創始人余饒理先生的《三字經新撰白話註解》內頁



A

DICTIONARY

OF THE

AMOI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CHIU, CHIANG-CHIU

AND

FORMOSA

BY

REV. W. CAMPBELL, F. R. C. S.

*Member of the Japan Society.*



TAIWAN, TAIWAN,  
THE HO TAI HONG PRINTING FACTORY.

臺南宣教師甘為霖著

廈門音新字典

西歷壹仟玖佰拾參年(西歷九五年第五版)



## THÂU-SŪ

Châi chit Tâi-oân tô-lâi, hâk-bûn sî hòe-tûi chin kú lah! Chū chin-chiâ<sup>a</sup> kú ê í-chêng, hâk-bûn sî kan-ta kúí ê thâk-chheh lāng teh bat; í-gôa tôa pō-hūn ê lāng, chin-sî chò seng-lí--ê, choh-sit--ê, á-sî chò kang--ê, it-chhè kap hâk-bûn sî chha-put-to lóng bó koan-hē. Koh-châi hiah ê thâk-chheh lāng só thâk só bat--ê, lóng sî kúí pah nî á-sî kúí chheng nî chêng ê lāng só giân-kūn ê kû chau-phoh; khah-chē sî lóng bóe thang báp sî-sē. Chióng-tiong khiok iá-sî ū hit hō put-sî to sî chin, kàu tô-lôh to sî ē hâp-ēng ê hó hâk-bûn; chóng-sî hōe hiah ê thâk-chheh lāng chhiau-pōa<sup>a</sup> liáu í-keng lâu-láu bó me-kak.

Goân-lâi hâk-bûn sî tui chē-chē lāng ê keng-giām, chē-chē lāng ê sim-su lâi cho-chit kiat-chiá<sup>a</sup>--ê. Kóng chit kú khah bēng, hâk-bûn chin-sî beh chhián-bēng sū-bút ê chin-ké, hó-phái<sup>a</sup>, súi-bái ê koan-hē, chêng-lāng hiáp-lék só chò-chiá<sup>a</sup>--ê; thang kóng sî chêng-lāng kong-ke ê chhiá-sún. Só-í hâk-bûn sî lāng-lāng to lóng tiōh ài ū. Lāng ê thau-náu bó hâk-bûn, pí pak-tó bó chiah-mih sî khah chhám. Tâi-oân ê hâk-bûn hòe-tûi kàu chhin-chhiū<sup>a</sup> kin-á-jit chit ê khoán; m̄-biáu kóng kàu sím-mih hâk-bûn; kan-ta bat-ji ē-hiáu siá phoe kî-siáu ê lāng, chit chng-siū chóng-khêng m̄-chai ū kúí lāng?

Châi chit Tâi-oân tô-lâi, thang kóng hâk-bûn ê kî-hng, í-keng sî liân-sòa chin-kú chin-kú lah! Chêng-lāng ê cheng-sîn í-keng sî iau-gō kàu kék-khám.

## CHÂP-HÂNG

## KOÁN-KIÀN

Chhòa Pôe-hôe tū

Tâi-chèng Châp-sî nî

1925

*Tâi-lân Sin-lâu Chheh-póng in*